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刘怀荣 孙丽 选编

日本汉诗研究论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怀荣 孙丽 选编

日本汉诗研究论文选



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本书为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规划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诗研究论文选 / 刘怀荣, 孙丽选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9822 - 3

I. ①日… II. ①刘…②孙… III. ①汉诗 - 诗歌研究 - 日本
IV. ①I313.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532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慈明亮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392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 刘怀荣 孙丽 (1)

日本汉诗概说

日本汉诗变迁概说	何乃英	(45)
日本古代汉诗初探	林岫	(56)
日本汉诗及其汉魂	孟昭毅	(68)
日本汉诗在中国	[日] 蔡毅	(80)

日本诗话研究

日本诗话的文本结集与分类	马歌东	(105)
论日本诗话的特色	张伯伟	(117)
面向中国的日本诗话	孙立	(137)

白居易与日本汉诗研究

白居易与日本平安朝诗坛	肖瑞峰	(155)
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高文汉	(167)
白诗和平安文学的女性形象	胡洁	(178)

日本汉诗人及其汉诗研究

诗化的六朝志怪小说	王晓平	(193)
-----------	-----	-------

论平安诗人菅原道真	高文汉 (206)
菅原道真汉诗的语言表达	[日] 静永健 (221)
夏目漱石晚年汉诗中的求“道”意识	刘岳兵 (233)
“汉诗人”河上肇的文化抵抗 ——《资本论》日本译介者的侧面像	陆晓光 (246)

日本汉诗专题研究

追溯日本文学的起点

——以《怀风藻》和《古今和歌集》为例	[美] Wiebke Deneeke (魏樸和) (269)
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	肖瑞峰 (279)
日本狂诗创作的三次高潮 ——从东亚汉文学史的发展角度着眼	严明 (294)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吴雨平 (307)

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比较研究

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日] 池田温 (319)
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诗词唱酬问题	陈友康 (333)
从汉诗看中国节日习俗对日本的影响	李寅生 (349)
明代文学东传与江户汉诗的唐宋之争	陈广宏 (358)
后记	刘怀荣 (374)

前 言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

刘怀荣 孙丽

日本汉诗是中国诗歌与日本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产生之初就与中国诗歌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唐代，中日文人间就有汉诗往来。明清时期，部分总集开始收录有日本汉诗，但入清以后，日本汉诗的西传，颇多曲折。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收作家 548 人，诗 5297 首，不但中国研究日本汉诗的奠基之作，在日本也是规模空前的一部总集”。“由唐至清，一千多年来日本汉诗在中国的流布，虽不能说触目皆是，却也斑斑可考，不绝如缕。”甚至晚清“诗界革命”可能也受到日本明治“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①。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这一极具特色的中日文化交流形式中止了。此后直至中华民国时期，关注日本汉诗的有 3 部汉诗集^②，3 篇文章^③，后者还不是研究性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日之间的文化往来和交流一度中断，直到 1972 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因此，中国国内的日本汉诗研究实际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到 2014 年 10 月为止，相关成果有著作 56 部，论文 384 篇，其中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42 篇。我们在此拟从纵、横两个方面，对这一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一初

① 关于唐代至晚清日本汉诗传入中国及中国学界对这类诗歌的关注问题，可参阅蔡毅《日本汉诗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② 据王宝平《近代以来中国人编日本汉诗（词）集述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民国时期的 3 部汉诗集分别为：齐燮元：《日本汉诗选录》，1925 年序刊，出版社不详；王长春编选：《和诗选》七卷，上海华中印书局 1942 年刊印；王长春编：《和诗百绝》，1942 年出版。

③ 为佳校（录）：《现代日本名家汉诗钞》，《东方文化月刊》1938 年第 7 期，第 111—112 页；乔桑：《沧桑所感：日本人之汉诗》，《华文北电》1943 年第 8 期，第 19 页；陈寥士：《日本诗人的汉诗：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外纪》，《长江画刊》1945 年第 1 期，第 21—22 页。

步的梳理和总结。

第一节 汉诗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日本汉诗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1980—1991）、发展期（1992—2000）和繁荣期（2001—至今）。

一 起步期（1980—1991）

相关成果有著作10部，论文11篇。论文数量较少，大多为基础性的描述概括。温祖荫将日本汉诗的发展历史、内容题材及艺术特色分别加以说明^①，尽管简略，但是却已经有意识地将日本汉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对象进行研究，这在此阶段还是极为罕见的。除了一些文学鉴赏性和介绍性的文章之外，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的，旨在强调中日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学历史关系。学者们注重将中国诗与日本汉诗及和歌进行比较，一方面发掘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二者的差异。雷石榆对唐代至20世纪8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背景下两国诗歌的发展脉络做了描述，指出“日本汉诗与和歌所反映的主题和思想倾向也多类似中国各类诗人”，特别强调了唐代以杜甫、李白、王维为代表的诗人其儒、道、佛思想对日本诗歌产生的作用，同时还指出两国自然环境的差异对诗人的影响^②。

著作则以各种日本汉诗选评注本为主，如黄新铭的《日本历代名家七绝百首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张步云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砚、马沁选编的《日本汉诗新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程千帆、孙望的《日本汉诗选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孙东临、李中华的《中日交往汉诗选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日本汉诗”主要还是被作为中日文学比较

^① 温祖荫：《论日本的汉诗——兼及与中华文化之关系》，《国外文学》1990年第Z1期。

^② 雷石榆：《关于汉诗与日本民族诗歌的关系——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中、诗歌代代相传中日友谊之声》，《河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研究背景下的一种文学形式，而并非学者们专门的研究对象。与此相应，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视野也不够开阔，但作为日本汉诗研究的萌芽阶段，则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发展期（1992—2000）

相关成果有著作 8 部，论文 62 篇，包括硕士学位论文 1 篇。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日本汉诗”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进行研究，对其产生、发展做了系统的考察。在延续上个阶段介绍、鉴赏及比较的基础上，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初具规模。如果说上个阶段还只是个别学者的偶发性研究，甚至还难免带着个人感悟色彩进行陈述的话，那么这个阶段则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性探索。日本汉诗不再仅仅是作为个别作家的作品，而是一种文学体裁甚至文学现象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所认识。

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一是学者们开始重视个案性研究，如蔡毅对赖山阳继承并发展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研究^①，肖瑞峰对菅原道真汉诗艺术性的总结及对汉诗集《怀风藻》和《敕撰三集》艺术性的探讨^②，都体现了个案研究的深入。二是中国诗人诗歌在日本的受容情况开始引起注意。如马歌东发表系列论文探讨日本汉诗对杜甫、王维、李白等中国诗人的受容情况^③。三是在诗论方面，以卢盛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遍照金刚（空海）的《文镜秘府论》的研究。这个时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这本书本身进行的^④，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中日诗歌理论的异同加以比较，涉

^① 蔡毅：《试论赖山阳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中国诗学》第 2 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肖瑞峰：《论菅原道真的汉诗艺术》，《杭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 年第 5 期；《〈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6 期；《从“敕撰三集”看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华文文学》1999 年第 3 期。

^③ 参见马歌东《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陕西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2 期；《试论日本汉诗对王维三言绝句幽玄风格之受容》，《人文杂志》1995 年第 3 期；《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李白诗歌之受容》，《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

^④ 可参见卢盛江《日本人编撰的中国诗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古典文学知识》1997 年第 6 期；《〈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南开学报》1998 年第 1 期；《关于〈文镜秘府论〉“九意”的作者》，《中国诗学》第六辑，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及对属论^①、意境^②、诗律^③等诸多方面。

第三，研究逐渐趋于深入和细致。如在对日本汉诗发展史进行描述时，除了利用传统的历史时期划分方法对汉诗的流变发展进行宏观叙述外，林岫、何乃英等学者在对每一阶段汉诗特点的把握上较之上阶段的粗略概括明显趋于细致^④。肖瑞峰则另辟蹊径，从汉诗在与和歌的竞争中历史地位的升降、在对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偶像崇拜”中日本汉诗作家“主体意识的迷失与复归”、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娱乐”与“言志”两种创作旨归所产生的对立与演变等三个独特的视角，对日本汉诗的发展轨迹作了深入探讨^⑤。另外，肖瑞峰还以“浙东唐诗之路”为切入点，通过对“天台”“剡溪”等唐诗意象的深入剖析，进而在中日汉诗比较中确立了日本平安朝时期汉诗发展的走向和特点^⑥。这种研究角度的转变无疑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就著作而言，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第1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研究著作。汉诗选注本仍是这一阶段的重点所在，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元明、增田朋洲主编的《中日友好千家诗》（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马歌东选注的《日本汉诗三百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王福祥、汪玉林、吴汉樱主编的《日本汉诗撷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黄铁城、张明诚、赵鹤龄主编的《中日诗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与上一阶段相比，日本汉诗作为一种专门研究对象，正式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入。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著名的汉诗作家和几部重要的汉诗集上，无论是对日本汉诗发展史的梳理，还是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日之间文

^①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② 王福雅：《〈文镜秘府论〉与唐代意境理论》，《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③ 黄绍清：《〈文镜秘府论〉的诗律学》，《东方丛刊》1992年第4辑。

^④ 林岫：《日本古代汉诗初探》，《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何乃英：《日本汉诗变迁概说》，《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⑤ 肖瑞峰：《且向东瀛探骊珠——日本汉诗三论》，《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⑥ 肖瑞峰：《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学的比较，主要还是在纯文学的层面进行的，并没有大的文化层面上的考量，如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基本上还是以对诗歌内容的分类和艺术特征的归纳为主；在比较研究方面，也多是以文本为出发点，探讨中国诗人及其作品对日本汉诗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

三 繁荣期（2001—2014. 10）

相关成果有论著 38 部，论文 311 篇，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41 篇。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相关的学术交流也逐步增多，如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都曾主办过东亚汉文学的学术研讨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这项工作，对日本汉诗的研究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就这一阶段研究总体呈现出的特点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野的拓宽。这一阶段更多的作家、作品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之中，如对雪村友梅、一休宗纯、正冈子规等诗人及其作品的关注。近几年来，对菅茶山和以绝海中津为中心的五山诗僧群体的研究也成了一个热点。在受容影响研究中，除了白居易、杜甫、王维等继续受到重视外，陶渊明、苏轼等中国诗人对日本汉诗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探讨的论题。此外，日本汉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现象，也颇受关注。如关于“和习”问题的研究，除了一些学术论文外，马骏的《日本上代文学“和习”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和郭颖的《汉诗与“和习”：从〈东瀛诗选〉到日本的诗歌自觉》（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有关汉诗的训读法及汉诗吟诵等专门问题，也有人进行了探讨。^①

第二，研究角度的增加。这个阶段除了延续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之外，和以前就文本作纯文学研究不同的是，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对日本汉诗做了新的解读。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学角度。如王晓平以《怀风藻》中难解诗语为中心，探讨了奈良时代诗人的“炼字”技巧问题。作者认为难解诗语并不全是表达

^① 辛文：《日本汉诗训读研究价值与方法论前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赵敏俐、李均洋：《日本汉诗的吟诵及启示》，《光明日报》2012 年 2 月 20 日第 15 版。

不成熟的表现，有些是因为诗人“受到六朝初唐字句雕琢之风的影响”而有意追求新奇的结果。作者从修辞学的角度对诗集中历来存在的疑问进行了考证和重新诠释^①。廖继莉则从音韵学的角度对《怀风藻》中的用韵进行了研究，指出《怀风藻》的用韵基本在《王三》音系的框架内，与隋初唐诗文有着共同的用韵特征^②。

二是文体学角度。从文体学角度对日本汉诗进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吴雨平的《橘与枳：日本汉诗文体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也是本阶段日本汉诗研究的优秀著作。作者将汉诗作为一种文体进行考察，研究这种诗体及其诗风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历程，并从中考察汉诗与日本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思潮间的关系以及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消长对汉诗发展的作用。张晓希的《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探讨。

三是形象学角度。如高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出发，指出深受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日本汉诗，除了在诗歌中表现出本国的风物人情之外，还建构出一个“文化中国”的形象，表现为大量运用中国典故、吟咏中国人物、描绘中国地理、表现中国传统意象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中日具有文化同源性的特质，而且日本文化常对中国文化加以“利用”，同时中日之间的诗人唱和也是中日之间文化交流的见证。作者还特别指出，这种“文化中国”的建构“主要指向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③。

此外，也有一些论文从历史、思想、翻译等角度，对日本汉诗进行了研究，与上述论著共同显示出这一时期研究视角的多样化。^④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样。随着学者们研究的逐渐展开和对西方一些研究方法的借鉴，这个阶段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

一是越来越重视对文本的细读，研究呈现细致化。如在论证中国诗人对日本诗人的影响方面，之前的研究虽然也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但往

^① 王晓平：《〈怀风藻〉的炼字技巧》，《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② 廖继莉：《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用韵研究》，《语言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高超：《形象学视野中的日本汉诗》，《名作欣赏》2011年第20期。

^④ 靳明全：《日本近世文论历史扫描》，《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吴雨平：《儒文化圈与日本汉诗思想体系的形成》，《求索》2007年第7期；杜海怀：《浅议日本汉文训读法翻译中国诗歌的局限性》，《中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往从大处着眼，而这个时期已经细化到从某一个意象或者某部作品入手展开论证。如在对杜甫的受容影响研究中，王京钰通过对义堂周信诗文中出现的“江云渭树”这一语词进行分析，发掘这一诗句的原创者——杜甫在五山文学时期的受容情况，指出五山文学“对杜甫重朋友情意的颂扬”^①。王京钰还通过对菅原道真的《九月十日》和杜甫的《至日遣兴二首》进行比较，认为这两篇异时异地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诗歌的表层结构还是意象营造，都有着鲜明的同质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平安朝汉文学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②。

二是文学研究与地理、哲学、风俗等层面的结合，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化意识。如唐千友对日本汉诗中出现的富士山意象研究，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象研究的路子，而是将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结合起来，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富士山这一意象进行解读，认为这是地理意象与诗人情感的完美结合，“具有地理意象和诗歌意象的双重特质”。这一形象也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西方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共同建构的结果，而且这种流变折射出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演变^③。

三是以文见史，文史互证的方法。如崔晓从日本汉诗入手，考察古代日本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日本贡举制度，认为“古代日本的贡举制度基本上全盘仿照中国唐朝的科举制度”，但“在古代日本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条件的作用下……与中国的科举制度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并终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④。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研究方法，如吴雨平认为应该用“传播研究”的方法去研究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⑤。

① 王京钰：《义堂周信诗文中的“江云渭树”——日本五山文学杜甫受容的一个侧面》，《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王京钰：《菅原道真与杜甫逐臣思君主旨诗歌中的意象同质性——以〈九月十日〉和〈至日遣兴二首〉为例》，《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4年第1期。

③ 唐千友：《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富士山》，《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日本汉诗中的富士山形象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④ 崔晓：《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世界历史》2012年第1期。

⑤ 吴雨平：《“传播研究”及日本汉诗人的文体意识》，《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2期。文中提到的“传播研究”是由王向远提出的用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用以代替“影响研究”的方法。他认为“影响”是一种关系的概念，“传播”才是信息流动的过程；前者是无形的，后者是有形的。见《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第四，研究逐渐深入。研究的逐渐深入是建立在以上提到的三种特点基础上的。研究视野的拓宽有利于对日本汉诗做更宏观和更全面的把握，为文学发展“史”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研究视角的增加有利于从多个侧面对日本汉诗进行认识和解读，诗人或者作品的存在价值及其意义能够得到全方位的发掘。至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更是为深度的加强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比如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对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可以形成对日本汉诗研究新的认识。如刘芳亮通过日本所藏公安派书目考察公安派输入日本的情况，并且以僧元政、石川丈山、梁田婉岩三人为中心，探讨了江户前半期日本诗坛对公安派的接受情况，发现这个时期的汉诗写作者“从整体上看这不过是日本千百年来引入中国典籍、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惯性行为，带有较强的个体志趣好尚，更谈不上出于纯粹的文学意识并以性灵说为基础形成群体诗学追求”^①。即便是对一些早就进入研究范围的作家作品，通过重读文本或者细读文本，也会有所突破，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对赖山阳的诗文的注译和研究，就很有代表性。

与前面两个时期的著作多以汉诗选注本为主不同，这个阶段出版的著作多以专题性研究为主，内容涉及很多方面，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几本著作外，像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蔡毅的《日本汉诗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严明的《花鸟风月的绝唱——日本汉诗中的四季歌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安勇花的《夏目漱石的汉诗世界》（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芳亮的《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都是这一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总的来说，跨入21世纪以来，日本汉诗研究无论是在广度的开拓还是在深度的发掘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以对《怀风藻》的研究为例，在汉诗研究起步期，几乎没有对这部日本最早的汉诗集进行过专门研究。到了发展期，陆续有学者关注，如高文汉、肖瑞峰等人主要对《怀

^① 刘芳亮：《江户前半期公安派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

^② 该书再版时更名为《日本汉诗渊源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在初版基础上有所改动。

风藻》中的汉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①。而在汉诗研究的繁荣时期，学者们对《怀风藻》的研究呈现出从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的特点。一方面能从小处入手，对文本的解读日趋细致化。如王晓平对《怀风藻》炼字技巧的分析^②，廖继莉对其用韵的研究^③；另一方面，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也能从大处着眼，将《怀风藻》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下进行观照。如徐臻以《怀风藻》中的山水诗为个案，对其中体现的日本奈良文人的精神气质和中国道教文化的探讨^④。潘小多以《怀风藻》中收录的四位具有代表性的遣唐使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作品中所体现的中国诗歌对日本汉诗的影响^⑤。

通过对日本汉诗研究历史进程的梳理，我们发现三十几年间学者们研究的立足点和倾向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从开始时站在本土立场，强调中国文学对日本汉诗的影响，到以日本汉诗为出发点，发掘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容，再到后来将两国的诗歌、文化进行比较。直至今天，学者们将对日本汉诗的研究纳入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范畴之内，在对他国的文学研究中反观自身，进一步确立本国文学的特质，树立本国文学乃至文化的世界历史地位。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节 汉诗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日本汉诗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诗发展分期、诗人和诗作、诗集和选本、受容与影响、中日比较、诗话和其他专题等七个方面。现就每一专题的研究情况简述如下。

① 可参看高文汉《〈怀风藻〉论析》，《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1期；肖瑞峰《〈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② 王晓平：《〈怀风藻〉的炼字技巧》，《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③ 廖继莉：《日本汉诗集〈怀风藻〉用韵研究》，《语言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徐臻：《〈怀风藻〉的山水与道教文化》，《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2期。

⑤ 潘小多：《〈怀风藻〉遣唐使汉诗对中国诗歌的接受与发展》，《文艺评论》2014年第8期。

一 汉诗发展分期研究

有关日本汉诗的发展分期，是很多研究者都关注的问题。就已有成果来看，学者们对日本汉诗分期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五期说。何乃英认为日本汉诗的发展脉络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上古，即从汉诗在日本的产生到奈良时代（710—794）；中古，即平安时代（794—1185）；中世，即镰仓室町时代（1185—1615）；近世，即江户时代（1615—1867）和近代，即明治维新（1868）以后。其中前三个阶段的日本汉诗可以被称为日本古代汉诗^①。赵乐甡将汉诗分为五个时期：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镰仓室町时期（1193—1603），江户时期（1603—1868），明治、大正以后（1868—1916）。这种划分与何乃英的划分基本一致，只是在时间上略有差异。赵乐甡还指出：“这种用汉语写成的‘诗’，日本学者过去认为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在日本文学史中不加论述，单在日本汉文学史（或汉诗史）中加以评介。现在，一般都认为汉语诗属于日本文学的一个方面，列入日本文学史。”^② 孟昭毅也以汉诗产生到奈良朝、平安朝、镰仓室町时代、江户时代、明治后为时间分界点，将日本汉诗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③。

二是四期说。温祖荫将汉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开创时期（公元7—8世纪）、发展时期（9—14世纪，包括平安、镰仓时代）、鼎盛时期（公元17世纪，江户时代）、衰落时期（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时期）^④。马歌东也持四期说，他认为王朝时期为源起时期，包括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期为发展时期，包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江户时期是全盛期，从江户幕府的创设到明治维新前夕；明治以后为由盛趋衰时期。^⑤ 吴雨平划分的四期为：王朝时代（646—1192，包括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山时代（1191—1602，包括镰仓时代、

^① 何乃英：《日本汉诗变迁概说》，《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② 赵乐甡：《诗有源流远处新——日本汉语诗述略》，《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

^③ 孟昭毅：《日本汉诗及其汉魂》，《唐都学刊》2003年第2期。

^④ 温祖荫：《论日本的汉诗——兼及与中华文化之关系》，《国外文学》1990年第21期。

^⑤ 马歌东：《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陕西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南北朝、室町时代和桃山时代)、江户时代(1603—1868,是从江户幕府创立到明治维新之前)、明治维新以后(1868—,包括明治、大正和昭和时期)。吴雨平还分别用“翰林时代”“丛林时代”“儒林时代”和“士林时代”来命名这四个时期^①。毛翰也把日本汉诗划分为王朝、五山及战国、江户、明治后四个时期,并分别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来指称这四个时期。其中王朝时期指的是从天智天皇起及整个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五百余年的时间^②。

三是三期说。以林岫为代表。她认为日本古代汉诗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奈良平安时代的贵族汉诗、镰仓室町时代的禅林汉诗和江户时代的儒士汉诗三个时期。^③

在对日本汉诗各个阶段进行历史性描述时,学者们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思路,即对每个时期的概况加以描述,举出代表性作家、作品,指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突出特点,并且进一步揭示这种时代性特点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此外,像高文汉、唐千友等人也对汉诗发展史进行了相对较为简单的描述^④。

二 诗人与诗作研究

关于日本汉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国内学者对于日本汉诗作家及其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结合汉诗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去研究其诗歌创作。肖瑞峰结合菅原道真一生的生活经历叙述了其从“诗臣”到“诗人”的创作经历^⑤。高文汉对菅原道真的生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说明,并且结合其身世遭遇将其人生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诗歌进行了分析。其中谈到诗人受到汉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因为与白居易有过类似的人生遭遇,所以一些诗歌

① 吴雨平:《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毛翰:《日本历代汉诗概览》(分为一系列4篇:《帝掬昆仑雪,置于扶桑东》《兴感苍凉神鬼泣,可无铁版换红牙》《只觉枯肠充锦绣,岂知风骨化神仙》《别有天成难学得,青莲风格少陵心》),刊于《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4期。

③ 林岫:《日本古代汉诗初探》,《学术交流》1992年第2期。

④ 参见高文汉《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唐千友《汉诗的东渐与流变——日本汉诗》,《学术界》2011年第7期。

⑤ 肖瑞峰:《从“诗臣”到“诗人”的蜕变——论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历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

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寄托上都有着明显受到白居易影响的痕迹^①。类似的文章还有占才成在介绍一休宗纯一生癫狂生涯的基础上，论述其创作汉诗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②。

有学者亦从诗人生平经历出发，但从中试图发现的是整个社会时代背景特别是外来的思想文化在个体身上打下的烙印，进而以此窥见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比如徐顺凤、王安江认为菅原道真一生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日本当时政治体制的重大转变，这是大和朝廷的氏族制的官司体制向中国的天子专制的官僚体制转变，菅原道真的没落“实际上是以藤原氏为代表的门阀摄关体制与中国的天子专制的官僚体制较量的结果”。此外，也能看到中国思想文化对当时日本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汉诗文当时独霸文坛的局面^③。再如，陆晓光在对河上肇汉诗写作的研究中指出“河上肇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开始研习汉诗并自觉表达认同儒家思想价值之意志的”，这“不仅具有拒绝与反讽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味，而且堪称是在文化领域坚持深层的反战抵抗。”^④

2. 从诗人的汉诗文本入手，重点解析其思想内涵或者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诗学理论。学者们从这个角度入手，集中探讨了以下的一些论题：一是夏目漱石的人生观、自然观及其诗学思想“则天去私”和“非人情”^⑤；二是菅原

① 高文汉：《论平安诗人菅原道真》，《日语学习与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占才成：《梦闺风流客，癫狂五山僧——日本五山诗人一休宗纯及其汉诗》，《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③ 徐顺凤、王安江：《从菅原道真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影响》，《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④ 陆晓光：《“汉诗人”河上肇的文化抵抗——〈资本论〉日本译介者的侧面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⑤ 具体可参看下述研究成果：封家骞：《略论夏目漱石的汉诗》，《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7年第1期；安勇花：《由汉诗解读夏目漱石的〈草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李玉双：《夏目漱石汉诗与“非人情”》，《学术探索》2012年第6期；揭侠：《漱石的汉诗与“则天去私”》，《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3期；胡兴荣：《〈明暗〉时期的汉诗与〈明暗〉及“则天去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沈洪楠：《“仁者乐山”——浅析夏目漱石汉诗中“山”的意象》，《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2期；沈洪楠：《夏目漱石汉诗中“山”的意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陈雪：《夏目漱石汉诗中的“白云”意象内涵探微》，《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等文章。